

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中的位置**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

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中的位置是一個重要而長久的論題。從全球的大學教育看，一方面，對通識教育一直議論多多，在實際推行上也不盡成功；另一方面，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則反覆被申述強調。那麼，在現代的大學裏，通識教育為甚麼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同時又能保持這麼堅韌的生命呢？

十九世紀德國大學首先將研究和創新知識作為大學的新功能，美國受德國影響，在英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基礎上又發展了研究院，由此形成了現代的研究型大學。我認為，只有在現代大學，特別是現代的研究型大學才有必要思考我們所謂的通識教育。在傳統大學或今天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並不會有關於通識教育的問題。那麼，支持這一想法的理由何在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過去的傳統型大學是以傳授知識為主的，也即以教學為主。但在現代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裏，創造知識與傳授知識變得同等重要，亦即「研究」與「教學」是大學兩個同等重要的功能。自研究型大學產生後，研究和創發知識成為大學的基本存在理由。大學極力強調研究方面的貢獻，就是這個原因。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 本文根據金耀基教授在「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2007年1月19-20日，香港中文大學）上的主題發言整理而成。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時，就準備將北京大學建立為中國現代大學的範型。他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非常有力地提出「研究」二字。此外，在大學的知識譜系中，他取消了經學，而將經學的內涵分別歸到文史哲這些科目裏。對於中國大學的教育而言，經學消失是極為重大的事，但應該注意到，中國大學將經學取消，與歐洲的現代大學取消神學是同步的。這標誌著現代大學的「知識」性格之轉變。現代大學以創造和傳授知識為主，一門學問是否能夠列入大學的知識譜系，或歸入大學中的科系，主要是通過科學的思維來判斷它是不是一種知識，此即是「知性」的知識。但是，眾所周知，中國的傳統教育講的是「做人」；西方傳統也一樣，紐曼（J. H. Newman）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訓練紳士（gentlemen），這些歸結而言都是做人的問題，屬於「價值」領域的知識。錢穆先生說得好，中國過去的教育由人統、事統和學統三方面構成。人統是講做人，事統是講做事，而今日的學科（discipline）則是學統。學統在今天不斷發展和膨脹；事統也在成長和發展；人統則基本上屬於價值教育（value education），而現代大學的知識性格已使價值教育失位了。中國的傳統教育跟現代的大學教育所重的「知識」教育是迥然不同的。簡單說，中國現代大學是從西方傳來，並非中國傳統所本有，換言之，現代大學是中國維新的產物。

上述中國大學變遷的情形與西方傳統大學的變遷很相似。西方大學的源頭在中古，而非希臘。在中古，知識的主要來源是《聖經》（Bible），解讀《聖經》用的是拉丁文，拉丁文是當時大學的共通語言。到了十八世紀後，大學受到啟蒙運動影響，開始重理性，追求真理。作為啟蒙產物的十九世紀現代大學跟十八世紀前以宗教為基礎的大學模式存在著很大差異，這是西方大學的基本變遷。

講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中的位置，必須先理解現代大學的性格。我認為在目前以研究為重的現代大學中，通識教育有它特殊的意義，通識教育在大學本科教育中，必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下面，我準備從三個角度談一談通識教育在現代大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

在現代的大學教育中，通識教育是相對於專業教育而言的。多年前，有一位哈佛大學畢業生問：到底怎樣才算是一個「知識人」或有教養的人（educated man）？甚麼是「知識人」？甚麼是有教養的人？是不是在大學畢業後就成了一個「知識人」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現代的大學：它有多少個學院（faculty）？涵蓋了多少個學科？開設了多少種課程（program）？各學系（department）又開設了多少門課目（course）？籠統而言，在現代的大學裏，往往有幾千門課目以上，例如加州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所有課目加起來可達一萬門之多。我們當然有很多理由來解釋這種情況，但從根本上說，這是知識爆炸和知識分化的結果，古語有云，即「道術分裂」。即使在同一個學科、同一個領域（field）中，隔鄰專業的同事跟你溝通恐怕都存在一定困難。劍橋大學的斯諾（C. P. Snow）提出「兩個文化（the two cultures）」之說，其實不過是指出了「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隔絕而已，如果不是十九世紀科學走進大學的話，今日大學的知識結構就不會是這種情形。但這情形不僅限於劍橋，也不限於西方大學，中國的大學亦如此。北京大學成立的時候就有文、理兩個學院。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文化」。當然，在十九世紀初，社會科學已開始發展，二次世

界大戰後，社會科學更是蓬勃發展。社會學家柏森斯（T. Parsons）認為，今天大學至少有「三個文化」。然而，「三個文化」只是就大的領域而言，裏面涵蓋了多少個學科？實在很難講清楚，今天的知識光譜實在是太大了。

面對如此大的知識光譜，大家或許都心存疑問：到底要學多少才足夠呢？到底要學哪一些知識呢？需要學到何種程度才達到一般人所講的「很有學問」？

今天講「很有學問」的意思跟過去已經很不一樣了。嚴格來說，專業化在過去從不是問題。儒家說：「一物之不知，儒者之恥」。目前的大學教師誰敢說這句話呢？現在的教師在一百樣事物裏面知道一樣，並能知得透徹，已經很好了。知識的膨脹已使我們不能再做「通人」或「通儒」。舉例來說，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這個議題，大家都或有一些認識，因為隨著這個議題的普及，大家對它的認識也慢慢變得多了。但是，若是問得深入一些，向你請教全球暖化的問題，如果你不是這個領域的專業研究人士，便不一定能準確地回答。這就說明我們已進入一個知識專業化的時代。

當然，為了知識和學術的發展，專業化必然是一個好趨勢。但是當觸及到大學的教育層面，問題就出現了。這麼多的知識，我們到底應該給學生教些甚麼？以前對此也有很多辯論，即所謂的專科教育與自由教育（specialization vs liberal education）的對立，並非直至斯諾的「兩個文化」發表時才出現。

在過去，我們可以將「專科教育」等同為「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職業有醫學、法律等，在傳統的西方大學裏，醫學、法律都是非常專業的。在這種情況下，「專科」跟「職業」之間幾乎可以劃上等號。但今天我們所講的專業不是職業，而是指現在的學科提供的都是專業性的教育

(specialist studies)，每個人都要在某個領域裏獲得專業性的訓練與培育，這跟過去「蜻蜓點水」、「甚麼都懂一點」的概念很不同。今天講的專業教育與職業訓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 是不同的。即使在人文學科中的教育也是一種專業教育。假設你的專長是中國文學領域的研究，大抵也只會對人表明你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如遇到同行，恐怕便要說清楚你是研究詩、詞或是某一個年代的文學了。因為若要把中國文學所有東西都弄精通的話，哪裏是你一個人便能做得到的呢？所以專業教育是知識發展所必然出現的狀態。

在專業教育為主導的形勢下，若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全人教育，那現代大學教育培養出的人便可能是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個人了。全人教育的理念，我完全認同。但我們要問，到底是甚麼構成全人教育？

我在英國劍橋的時候，曾經非常幸運地遇見一位名叫阿詩比 (M. F. Ashby) 勳爵的老先生。他是位傑出的生物工程學者，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認為，自由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對立是偽對立。他說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目標是要培養紳士，但紳士要重新定義，我們必須將專業教育作為自由教育的手段 (We must use specialist studies as a vehicle for liberal education)。要怎樣培養一個有文化、有知識和教養的人呢？他認為：「通向文化的道路，必須要通過專業，而不是繞過去 (The path to culture should be through a man's specialization, not by-passing it)。」請大家想一想，今天，在大學教育如此專業化的情況下，要求學生在各個知識領域都做到精通，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阿詩比勳爵認為大學教育必須通過專業訓練。

杜拉克 (P. F. Drucker) 是管理學的大師，他對教育也發表了很多見解。他在《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就是假如不能把專門的知識整合到整個知識體系裏，這樣的人文教育，根本就不配稱為人文教育。

我想強調甚麼問題呢？今天我們整個的大學教育，從組織來講，是由各種學科組成的，各種學科對等於知識的某個方面。有些大學曾試圖打破學系的組織框架，也即作跨科際的組合，但學科的主體性、獨立性終究是大學教育的骨幹，而學科就意味著專業教育。學科的專業化在大學已生根，它是知識發展的內在需求，即使再討厭專業化，它也不會消失，它將繼續存在！因此，必須要正視。

剛才提過阿詩比勳爵的觀點，他表現出肯定專業教育的姿態，這也是我們今天大學教育的實際情形，但是阿詩比勳爵認為，學生在接受專業教育的同時，必須有人文教育相配合。他甚至說，如果大學不去培育科技的專業人才，大學就不能生存，反之，如果大學不重視價值教育（是非、善惡、正義、自由等觀念的判斷），就不算是大學。這問題，我們下面還會談到。

現代的大學教育可視為一種培養專業人才的體制，只有經歷專業教育的學生才能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骨幹，但要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還需要具備其他知識。在這種情況下，通識教育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愈是專業教育主導的大學，就愈要問怎樣才可成就一個「知識人」。通識教育的存在與發展，可以說是這個問題引發出來的。

一個年輕人進入大學，他有那麼多專業課目要學習，怎樣才能令他還有時間和精力去接觸、吸收專業以外的知識？這涉及到通識教育在大學中的存在空間。研究型大學發展得愈好愈需要為通識教育提供空間。

二、知識的科學範式（scientific paradigm of knowledge） 與價值教育問題

價值教育在現代大學中的地位愈來愈成問題。儘管我們常聽說大學教育應智育與德育並重，但到底能找到多少可稱為德性培育的課目？

近二三十年來，不斷可以聽到人批評大學教育的聲音。2006年，哈佛大學前任文理學院院長路易斯（H. Lewis）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沒有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卓越」，在路易斯而言，指的是在研究、學問方面的卓越，也就是個人的傑出成就。「沒有靈魂」是甚麼意思呢？說的是現代的大學不能培養出學生優良的品格與崇高的人生價值目標。我們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傳統大學培養的學生一定很有品格，很有崇高的人生價值目標。但無論如何，傳統教育的確堅守了一種理念，那就是大學要培養出德性優美的人才。

當初蔡元培先生提出大學要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我們今天聽了，可能會覺得費解，這個道理誰不知道呢！但在當時而言，是很令人耳目一新的。呂思勉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當他聽到蔡先生的「研究」二字後，覺得是聞所未聞的。傳統大學教師的天職是傳道、授業、解惑，現代的大學教師還有一個創造知識的任務，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現代大學在研究和創造新知識上，的確成就非凡。但是現代大學在教育上和培養人才上成績如何？路易斯的批評很值得我們去反思。我們都很清楚，今天的大學仍然希望培養有教養的人。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辦學時，曾提倡通才教育。他對教育的各個面向分得很清楚，認為教育包括知識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按錢先生這番話，人格教育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就是價值教育的範疇。

價值教育在今天的大學出了問題。是不是因為大學以知識掛帥？是不是因為大學只追求研究的卓越，所以失去了靈魂？我認為既不是知識掛帥，也不是太重研究的問題，而是現代的大學把知識的定義狹窄化和單維度化所導致的結果。

大家可能都看過，幾年前貝拉（R. Bellah）跟他的幾位同事、學生所寫的《心靈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以及其後的《新

世界啟示錄》(The Good Society)，這兩本書在美國引起了許多討論。貝拉認為現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甚至全世界所有的研究型大學（一些中東的伊斯蘭大學或許可以除外），都普遍地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對知識的定義已經出現了一個知識的科學範式。甚麼才構成知識呢？必須要具有科學性，這是自啟蒙以來才出現的。在「知識的科學範式」下，知識就變成了等同於科學。換言之，科學不只是知識的一種，知識就等如科學。換言之，不是科學就成不了知識。在這種「科學主義」的氣候下，產生了人文學科的知識合法性問題。我一直認為“humanities”這個詞，中文翻譯為「人文學科」比較恰當，但有的人就喜歡譯為「人文科學」。原因很簡單，就是科學的知識地位高啊！科學之重要是不待言的，但「科學主義」則會壞事。

在社會學界有位極有影響力的學者帕森斯，他晚年著力於大學的研究。他研究大學，尤其關注現代大學的知識性格。他認為現代大學已經變成了一個「知性的複合體 (cognitive complex)」，也就是說，大學裏從事的都是知性活動。「知性的複合體」與傳統大學之為「道德—價值複合體 (moral-evaluative complex)」形成鮮明對比。過去，中國傳統的「經學」，西方宗教的《聖經》，都屬「道德—價值複合體」。

大家或許會問：我們的大學教育到底要做甚麼？有空的時候，大家不妨到崇基學院走走，在未圓湖邊上看看四個字——「止於至善」，這是出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其實，全世界的大學都有以「止於至善」為鵠的，沒有人會說大學教育不要道德。蔡元培先生雖然把大學定性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但他一樣堅持把「德育」和「智育」聯在一起。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有位名叫雷斯曼 (D. Riesman) 的社會學家，就是很多人熟知的《寂寞的群眾》(Lonely Crowd) 一書的作者，他曾指出，「我們今天活在一個

沒有信仰的高等學術的世俗教堂裏」。要知道，中古時代的大學是講信仰的，教堂是建基於信仰之上的。西方中古的大學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至善」。

二十世紀早期，哈佛大學有一位校長科南特（J. B. Conant），他本人是一位科學家，但作為校長，他也曾主持哈佛的通識教育課程。雖然他相信科學是真理唯一可信的來源（only reliable source of truth），但不相信科學能為一個自由社會的生存提供必需的價值元素。講到底，講大學教育不能忘記對「甚麼是好的社會（good society）」、「甚麼是美好生活（good life）」作出提問。為此，我們必須作倫理反省（ethical reflection）。我們生活在當代，每日都不可避免進行倫理反省，從全球暖化到應不應該進行胚胎培植，都是重大的倫理問題，這比過去考慮的問題大得多，例如：忠君報國的問題遠不及複製人的問題來得更重要。在大學裏，科學家可以有重大的發明與發現，可是如何循正常教育途徑培養出能做出恰當的倫理與價值判斷的學生卻並不簡單。大學如果缺乏價值教育的話，學生在倫理判斷（ethical judgment）的養成方面勢必會顯得薄弱。所以，如果對知識採取單維度的定義，即認為知識就是科學，從科南特校長的話就知道，唯科學或純知性的知識，未必能為我們建構「好的社會」。

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是位很了不起的文學家，他曾說科學是沒有意義的。他當然不是說科學本身沒有意義，而是認為科學不能為「我們將做甚麼？我們應如何活？」這類問題提供答案，所以是沒有意義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講得更清楚，他說，科學不能為我們提供意義方面的答案。他認為在意義的問題上，科學與理性只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手段」，而「目的」是由我們的價值來決定的。在我個人看，大學裏的知識絕不能是單維度的，即知識不能只限於科學，知識教育之外，還要有人格教育、文化教育，亦即必

須要價值教育。大學是在培養公民（citizens），大學教育要為未來社會培育共和國公民（republican citizenship）。如果不培育公民的話，難道培植學生找份職業吃飯就是教育的目的嗎？當然不是。我們希望學生畢業以後能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並且對建立一個「好的社會」有所貢獻。但通過甚麼途徑來實現價值教育呢？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D. Bok）認為，現在大學的價值教育實際上是被安排到學生的課外活動中去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份報告，我覺得很有意思。這份報告說，在二十一世紀的教育中，知識要包括四個維度：1. 學習知識（learning to know）；2. 學習做事（learning to do）；3. 學習與他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4. 學習成就自我（learning to be）。在以上的知識維度中，通過科學知識，可以達到“learning to know”和“learning to do”，但“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和“learning to be”卻非僅憑科學便可勝任。這說明知識的單維度化對大學教育而言是不足夠的。唐君毅先生有個觀點，他認為中國傳統中有一種學問，這種學問將人自身作為主體的存在者看待，而求此主體之存在狀態逐漸超凡入聖，這個過程叫做「修為」。這種學問，有別於科學知識，是中國的理學、心性之學、聖學，這是唐先生對中國心性之學的定位。

價值教育問題不是小事，在大學教育中，價值教育應該有安放之地。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時主張以美育代德育，並將經學從大學教育中取消。經學基本上屬於德育的範疇，蔡先生卻以美育來代替德育，理由何在呢？我認為蔡先生可以說是知識的科學範式的支持者，在他看來，不能成為科學的知識，就不能進入大學。但是他又明明知道道德教育太重要了，辦教育就是要培育有品格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蔡先生以美育代德育的觀點，其實蘊含著深刻的意義。用蔡元培先生自己的話說，美育可起到陶冶性情、提升品格的作用。但為甚麼要

用美育替代德育呢？因為美學可以成為知識，可以放在大學的知識譜系中，而同時美學又有教化的作用。蔡先生實際上是希望藉美育美學通向善的境界。芝加哥大學的經典名著教育，其中六大觀念之一是美（其它是真、善、公平、自由、正義），美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知識的層面，就是「真」；另一個層面涉及對「欲望（desire）」的看法，即講「善」。「美」跟「善」、「真」是相通的。這個觀念跟蔡先生不謀而合，美學實具有倫理的意義。

我覺得，蔡先生將美學放到大學的教育裏去，就是肯定價值教育在大學中的位置。今天我願意正面提出來，大學教育必須給價值教育一個位置，而價值教育正可以是通識教育的一個核心。

三、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問題

歐洲的中古大學有一點非常之了不起，即它代表了一種世界精神，但中古的世界精神是以基督文明世界（Christian world）為範圍的。中國以前講「天下」，其實是「儒學」的天下，以中國為中心。顯而易見，今天的全球化絕不止於此。中古時候的共同語言是拉丁文，中古大學宣揚的是西方文明；到十八世紀，大學變成是民族性的，這跟民族主義的興起有一定關係；十九世紀知識越趨普世化，科學是絕對世界性的，我們不能講「中國的物理學怎麼樣」，只能說「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怎麼樣」，知識愈來愈有普世性。今天，大學愈來愈具有全球性格，不止是大學的知識結構如此，連大學的治理結構也具有世界性。

今天，一流大學裏的學生和教授很少完全來自某一特定的國家或地方。民族文化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關係是今天大學必定會遇到的。全球（global）與本地（local）的關係更加不可避免。今

天的大學是不是為人類造福？答案是肯定的。但這是否會淹沒民族文化？我認為民族文化不會也不應被淹沒。講到底，中國的大學教育是為中國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明秩序。我們傳統的文明秩序有好、也有不好的方面，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講到政治秩序，會考慮到民主、人權；講到經濟秩序，會考慮到市場理性，這些都屬於制度的現代化。這個文明大工程之建立要靠我們的學生，大學課程中所教授的知識需具有普世性格。可是，除了傳授普世性知識外，我們還要實現中國大學教育的特殊目標，那就是維繫和發揚中國文化，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創校的目標之一。中國文化在大學裏怎樣去發揚？就課程的安排而言，各學科的專業教育有其專門的目標，因此，我認為只有全校性的通識教育最能發揮作用。

當然，中國文化只是通識教育中的一部分，其他異國文化，環境議題（environmental issues）等都十分重要。

我今天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通識教育存在的理由，闡明了它在現代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裏的位置。請大家指教。